

“潜规则”与中国王朝循环的经济根源

——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张德荣¹, 杨 慧²

(1.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山东经济学院 经济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 文章在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内探讨了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力和阻力, 强调了制度的内生性质, 提出了中国传统社会资源约束制约制度变迁的假说, 以此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流行的“潜规则”现象, 并透过该现象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对外开放为我们打破恶性循环提供了可能,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工业化战略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制度变迁影响深远。

关键词: 潜规则; 博弈均衡; 制度变迁; 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11)03-0039-11

一、问题的提出

学者吴思(2002)最早使用“潜规则”一词,“潜规则”一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用词汇之一,在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联合制作的“2006年中国报纸、广播、电视十大流行语”中,“潜规则”位列前茅。^①对于吴思的这一“创造”,中国社会的反响竟然如此热烈,引人深思。根据吴思的定义,“潜规则”是指没有被明确宣示但却在实际运作中被普遍遵循的规则,相对应的是那些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虽被官方大力提倡却在现实中不能被遵守的“显规则”。我们的问题是:(1)规则为什么要以秘而不宣的形式存在,“潜规则”为什么不显性化?(2)既然“潜规则”为人们所普遍遵守,那么,那些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并不为人们所遵循的“显规则”又有什么意义?

与中国传统社会流行的“潜规则”现象一样,王朝循环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的社会经济转型,制度转型已经步入关键性的“历史三峡”,暗流涌动,各种矛盾开始凸现。我们通过对“潜规则”现象的分析,试图解开制约中国传统社

收稿日期:2010-09-03

作者简介:张德荣(1972—),男,山东青岛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杨 慧(1974—),女,山东济宁人,山东经济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谜局,找到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的经济根源,以更好地把握促进中国社会实现顺利转型的制约条件。

二、“潜规则”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制度

诺思(1994a)认为,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并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但吴思的“潜规则”与诺思的非正式制度是不同的。在诺思的理论里,非正式制度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起构成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正式组织只有在存在非正式组织的情况下才有活力和生存的前提……任何一方都缺少不了另一方”(Furubotn 和 Richter, 1997)。但在吴思的著作里“潜规则”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而与“潜规则”对应的官方宣示的部分“显规则”却并不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根据诺思的定义,由于“潜规则”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现实约束,所以“潜规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但是诺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潜规则”之外仍有一套与之对应但却不能发挥作用的“显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不能归因于规则的含混不清、不易表达(Schlicht, 1997),因为“潜规则”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明确的,只是不能摆到台面上。“潜规则”的出现同样不能归因于信息不对称,因为“潜规则”的长期使用,无论对于官僚阶层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不能用一方欺骗另一方来解释“潜规则”与“显规则”的同时存在。

青木昌彦(2001)认为,“制度是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shared belief)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既有主观的形式,又有客观的基础:(1)制度内生于经济系统,制度建立在博弈均衡的基础上,按照某种规则行事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没有人愿意偏离它,这种具有可执行性的规则才是制度,“只有均衡才是可能的契约”(宾默尔, 2003);(2)制度具有主观形式,制度是一种信念。所以,制度是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存在均衡的客观基础,“观念的东西至少是在可能的现实世界里要行得通”(宾默尔, 2003)。同时,制度又不仅仅是对利益均衡的一种简单反映,人的主观精神、意识形态等因素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在多重制度博弈均衡的情况下(Schotter, 1981),制度具有某种程度的外生性,历史人物可以通过观念的力量来使社会选择更有效率的博弈均衡(宾默尔, 2003)。

由此可见,制度作为一种信念系统,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制度规定并不是一回事。在以往的社会中,一些“显规则”没人遵守,而发生作用的却是大量的“潜规则”,这诸多的“潜规则”就是制度,而那些挂在墙上、写在纸上的制度规定不一定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

三、交易成本、“潜规则”与王朝循环现象

(一)博弈均衡视角下的交易成本

从博弈均衡的视角来理解制度可解开“潜规则”之谜。从博弈均衡的视角理解制度强调的是制度的可实施性,强调制度的内生性。考察制度变迁必须从均衡的约束条件入手,约束条件变了,建立在博弈均衡基础上的制度才有可能变迁。在影响博弈均衡的诸多约束条件中,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诺思, 1994a、1994b)。作为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分析工具,交易成本同制度绩效联系在一起,它被用来衡量制度的优劣。威廉姆森(2002)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的和作用都在于降低交易成本”。^②但是,Wallis 和 North(1986)估计美国 1970 年的收入中 54.71%应归于交易成本,这一比例比 1870 年高出 28.62%。如何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剧烈上升这一事实,是制度更没有效率了吗?

分工是国民财富增加的源泉,但是在分工演进的过程中,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歧可能会加剧。从抽象层面来看,人有两种获得财富的方式:一种是以合作的方式获得财富,即参与社会分工,通过生产并与他人交换获得财富;另一种是以非合作的方式获得财富,即从别人手里转移财富。很明显,如果每个人都诚实生产,并通过交换推进社会分工,这是社会理性的表现。但是对追求个体理性的人来说,合作生产并不总是最优选择,非合作的方式可能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利益,社会理性并不会自动实现,“囚徒困境”描述的就是这种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

表 1 囚徒困境($x > y > 0 > z$)

A \ B	诚实		欺骗	
	诚实	欺骗	诚实	欺骗
诚实	y	y	z	x
欺骗	x	z	0	0

注:每组数字的第一个数字是 A 的交易收益,第二个数字是 B 的交易收益。

在表 1 的交易博弈中,如果 A 和 B 进行合作,在各自生产之后进行交换,每人的净收益为 $y(y > 0)$,社会净收益是 $2y$ 。如果在交易过程中,A 采取诚实策略,B 采取欺骗策略,A 的净收益是 $z(z < 0)$,B 的净收益是 $x(x > y)$,^③ 社会净收益是 $x + z$ 。由于欺骗的非生产性质,非合作交易必然存在效率损失,所以有 $2y > (x + z)$ 。如果两人都采取欺骗策略,那么不可能存在交易,由这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每人的交易收益为 0。

根据我们的设定,上述博弈的纯策略均衡是(欺骗,欺骗),相对应的均衡支付是(0, 0)。在上述博弈的均衡状态中,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不一致所导致的社会效率损失是 $2y$ 。虽然在均衡状态,A 和 B 没有市场交换,社会潜在净收益 $2y$ 却被一种无形的成本所抵消而得不到实现。根据汪丁丁(1995)的理论,这种无形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与分工和专业化相关的费用”(Furubotn 和 Richter, 1997)。这里交易成本大于 $2y$,高于合作的潜在收益,所以分工合作没有发生。交易成本类

似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交易成本只有在被分工的利得所抵消时才能得到度量,我们只能从社会分工深化程度来观察一个社会交易成本的大小。

很显然,在表1的博弈中,A和B的福利都存在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如果我们引入一个第三方C,假设A和B双方都同意服从C的权威,C承诺为A和B的合作提供监督和保障,惩罚不合作的一方,则现有的博弈均衡有可能发生变化。政府是第三方制度安排的主要形式,^④政府承诺为A和B的合作提供安全和保证,同时政府的运作需要一定的费用,对A和B来说,这就是税收。政府运作费用包括两个部分,固定部分和变动部分(Furubotn和Richter, 1997),因而政府运作的成本函数可以设定如下:

$$T=c+t \times 2y$$

其中,T为总成本(总税收),c为政府运作的固定成本,t为税率($0 < t < 1$), $t \times 2y$ 为政府运作的变动成本,即根据产出征收的税收。如果 $2y > T$,即 $y > c/[2(1-t)]$,则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该交易就是有价值的,政府的介入可以化解“囚徒困境”,使得(诚实,诚实)均衡得以实现,社会净收益为 $2y - c - t \times 2y > 0$,政府税收T构成社会政治型交易成本(Furubotn和Richter, 1997)。第三方制度安排(政府的出现)降低了阻碍分工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 $2y$),但同时带来了政治型交易成本T。因为 $T < 2y$,所以伴随着制度变迁,交易成本下降了,制度效率因此得以体现。

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永恒的,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深化,相对于知识和信息的增长速度,人的认识能力越来越有限,资产的专用性由于分工的深化而增强,因而无论是从信息的角度(Richter, 1989),还是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威廉姆森, 2002),制度费用的增加是必然的,但带来这种费用的制度却降低了原有分工状态下的交易成本。所以,从博弈均衡的视角考察交易成本,可以化解“威廉姆森命题”与Wallis和North(1986)的实证考察之间的悖论,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制度效率之间的一致性因而得以实现。

(二)交易成本与“潜规则”

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交易成本会阻碍分工合作的实现,而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分工合作,但制度本身亦有成本,相对于合作收益来说,制度成本的高低从制度供给方面决定了制度的可能变迁,从而影响了可能的分工深度。我们仍假定社会由两个人A和B组成,A和B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A和B在什么情况下合作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不合作便取决于合作的潜在收益和制度供给的成本。作为一种博弈均衡,合作或者不合作反过来会强化参与人的信念,这种被强化的信念就是制度。根据上一部分的设定,分工能否深化的关键是不等式 $y > c/[2(1-t)]$ 成立。此不等式成立的影响因素有三个: y , c 和 t 。从比较静态的角度看,分工潜在收益(y)越高、政府运作成本(c 和 t)越低,不等式的成立就越有保证,社会分工也就越趋深化。相反,当一

个社会对制度创新的支付能力很低,或者该社会制度供给成本很高,以至于 A 和 B 没有能力承担制度供给成本时,保证交易公正进行的第三方(政府)不会产生,均衡支付会持续维持在(0,0)水平。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均衡,没有分工的深化,经济发展缓慢。

但是如果在分工潜在收益水平 y 不变的情况下,在自给自足的均衡状态下出现了一个能够低成本($T' < T$)运作的政府,满足如下条件: $2y > T'$,即 $y > c' / [2(1-t')]$ ($c' < c, t' < t$),则该交易博弈就有可能打破目前的自给自足状态,参与人 A 和 B 就有可能获得合作收益,短期内分工深化就有了保证。但问题是,相对于正常的政治型交易成本(c 和 t)来说,政府要让参与人 A 和 B 相信其能够降低制度供给成本(达到 c' 和 t'),就必须有所承诺,这种承诺往往是由在政府竞争中取胜的一方(开明君主)做出的。^⑤但这种承诺的置信性是有问题的,在社会基本经济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一承诺的有效性只能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能力基础上。一般情况是,在新王朝开始的一段时间,由于优秀统治者的低成本制度供给能力,社会分工在短期内发生深化,会出现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期。为增强承诺的可信性,政府有必要将承诺上升到法律或者原则的高度,这就是与“潜规则”相对立的官方宣示的“显规则”。“显规则”的有效性 with 开国君主的低成本制度供给能力联系在一起,它的可信性也建立在这种能力的基础上。显然,这种博弈均衡有利于参与博弈的每一方,但这种均衡能否持续取决于后继统治者的制度供给成本。有效率的合作制度只能由优秀统治者来提供,或者说是由在政府竞争中的优胜者来提供。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旦一个王朝建立,这种竞争选拔机制便不复存在,没有必然的机制来保证统治者的制度供给是低成本的。当制度供给成本提高的时候,博弈均衡就会进入另一种状态,这种博弈均衡就会定义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由高成本制度供给情况下的稳定均衡所决定,由这种稳定均衡所决定的制度名义上不能与“显规则”相冲突,因为统治者需要关于其统治合法性的理念支持,但由于这又是一种稳定的博弈均衡,所以它只能以“潜规则”的形式出现,即只能做不能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制度供给成本的持续上升不可避免,“潜规则”便成为政治型交易成本较高情况下的一种信念系统,是大家真正遵守的制度,而正式标明的“显规则”便成为一种理想,是一种促进合作、实现统治者与民众多方共赢的愿望。所以,“潜规则”的出现是对政府制度供给成本提高的回应,“潜规则”在社会上的流行实质上反映了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上升。

(三)“潜规则”与王朝循环现象

“显规则”与“潜规则”交替发挥作用体现了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变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变化又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亡,因而“潜规则”现象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王朝兴替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能够对政府实现有效约束的只有暴力革命,“潜规则”的盛行表明现有统治集团已经不能

有效地实施自我约束,政治型交易成本大幅上升的实质是官僚集团对民众的过度掠夺,势必引发新一轮的政府竞争,直至出现新的统治集团。对于新的统治集团而言,考虑到前朝覆亡的前车之鉴,新统治集团可能实施制度方面的改革,强化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在一定时期内降低政治型交易成本,从而再次发挥“显规则”的效力,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由于既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和人口因素使得这种局面难以持续很长时间,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从而导致王朝由兴而衰。所以,“潜规则”的流行暗含着政治型交易成本大幅上升,预示着新的政府竞争即将开始,而“显规则”的重新发挥作用则表明新王朝能够以较低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维持统治。所以,“潜规则”和王朝循环现象均与高政治型交易成本有关。

问题是,在传统农业社会,政治型交易成本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规律性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四、“潜规则”和王朝循环现象的经济根源

(一)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度量

由于市场交易越来越超出人格化的范围,产权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政府来界定(诺思,1994a、1994b),因而与政府运作相关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民族国家里,政府是最大的非生产性集团,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支出构成一个社会的政治型交易成本。Wallis 和 North (1986)用政府交易活动的支出价值对美国政治型交易成本的规模进行了测量。金玉国、王琳(2010)用公共部门消耗或占用的社会资源规模测算了我国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即从公共部门占用的物力、人力和财力三个方面出发,寻找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建立了宏观层面的政治型交易成本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宏观政治型交易成本与微观政治型交易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从上述宏观层面测度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合理性。

受上述研究的启发,我们认为,从社会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人力资源可以自由选择政府部门和生产性部门就业的假定下,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会导致两部门人员收益在边际上的均衡,因而,一个社会的政治型交易成本基本上可以通过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对数量来间接度量。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在政府部门和生产性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能够反映该社会的政治型交易成本状况,并影响分工深化和经济发展。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以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对规模来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型交易成本。

(二)封闭农业经济中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局部均衡分析

我们假设存在两种函数:一种是非生产性活动的收益函数,一种是物质财富生产函数。假设非生产性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可以忽略不计,两种函数

形式如下所示：

$$Q_g = f(L_1), Q_p = F(1 - L_1, R)$$

其中, Q_g 、 Q_p 分别表示非生产性活动的产出和生产性活动的产出, $f(\cdot)$ 、 $F(\cdot)$ 分别表示两种活动的投入产出技术关系。我们将一个社会的人口总量标准化为 1, L_1 是参加非生产性活动的比例, $(1 - L_1)$ 是参加生产性活动的比例。根据我们的讨论, L_1 的大小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型交易成本。R 为人均物质资源数量(在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是人均土地数量)。假定两种生产函数均满足边际劳动生产效率递减规律, 在比较静态的意义上, 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与人均资源数量正相关, 即有:

$$MR_1 = \partial f / \partial L_1 > 0, MR_2 = \partial F / \partial (1 - L_1) > 0$$

$$\partial^2 f / \partial L_1^2 < 0, \partial^2 F / \partial (1 - L_1)^2 < 0$$

$$\partial^2 F / \partial (1 - L_1) \partial R > 0$$

理性个体在这两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 无差异的均衡条件为:

$$\partial F / \partial (1 - L_1) = \partial f / \partial L_1$$

上述均衡可以用图 1 来说明。非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MR_1 和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MR_2 相交于点 E。在点 E, 两种活动的边际收益相等, 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流动达到均衡, 决定了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人员比例 L_1 和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员比例 $(1 - L_1)$ 。

通过比较静态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结论:

(1) 技术水平越高, 社会交易成本越低。在人均物资资源数量 R 不变的情况下, 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了, 如图 2 所示, 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MR_2 会往左上方移动, 新的生产性活动边际收益曲线 MR_2' 与非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MR_1 相交达到新的均衡, 由新均衡所决定的非生产性活动人员的比例减少到 L_1^* ($L_1^* < L_1$), 社会交易成本降低。

(2) 人均物质资源条件越好, 社会交易成本越低。人均物质资源越丰富 (R 越大), 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曲线 MR_2 越靠近左上角, 由新均衡所决定的非生产性活动人员的比例减少, 如图 2 所示。在传统农业社会, 人口数量的上升是导致人均物质资源(土地)拥有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来说, 在技术水平不变或者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 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人员的比例与该社会的人均物质资源状况相关, 即一个社会的人均物质资源越贫乏, 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人员的比例越高, 政治型交易成本越高。

(三)“潜规则”和王朝循环的经济根源

根据上述逻辑, 我们试图对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循环现象进行如下解释。根据中国历史基本事实, 每一个主要王朝的建立都是暴力竞争的结果,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 人口大量减少。所以, 当一个新政权确立以后, 由于劳动要素的稀缺性, 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较高, 而土地要素的租金水平相对较低, 这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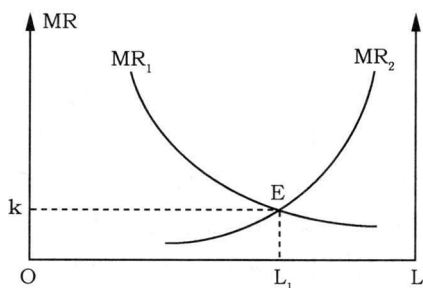


图1 两种活动的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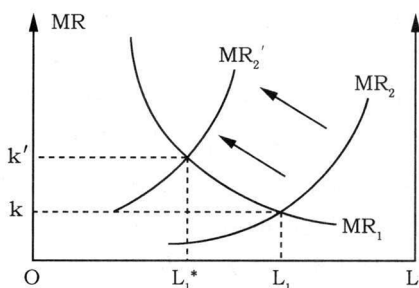


图2 比较静态分析

规模战争之后的“休养生息”局面。当然，这一局面的形成还得益于原有利益集团的崩溃，以及开国君王对政府体系自上而下的约束。但是，社会一旦承平日久，人口就开始增加。人口增加将导致对土地需求的增加，土地需求增加的一个必然后果是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收益提高，劳动要素的收益下降，即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下降和土地租金上升。一旦这种经济力量导致了租金水平上升，非生产性行业的回报（控制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必然提高，由于政府拥有暴力工具，是产权的界定者（诺思，1994b），所以加入政府部门将更加有利可图，社会人力资源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比例将上升，政治型交易成本上升。

由于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人数膨胀，统治者越来越难以对整个官僚机构加以有效约束，从而加入政府部门更加有利可图，加速了政治型交易成本的上升。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一积弊，历史学家钱穆（2001）从政治文化层面进行了批判：“……只鼓励人当大学者、当大官，却不鼓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为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竟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其实，人们对政府部门的趋之若鹜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背后更有利益结构的支持，政治型交易成本在上述力量的推动下螺旋上升，这种状况恶化到极点就是王朝末期出现的“十羊九牧”现象。当政治型交易成本超出传统农业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时，新一轮的暴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很快就会产生，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将在再一次的战争中被毁灭，人口将大规模下降，直到另一个暴力集团在战争中取胜并建立统一政府。上述逻辑可以用图3来加以概括。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识到，以封闭和技术进步缓慢为特征的农业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型交易成本必将随人口的膨胀而上升，而且，由于特殊的专制体制，政治型交易成本会呈现加速上升态势，从而整个社会经济将难以收敛于一个均衡态势，整个社会的均衡只能靠战争来维持，即通过战争来减少人口和选择较低政治型交易成本的制度供给者。政治型交易成本有规律的变化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潜规则”现象流行与王朝兴衰的共同基础。当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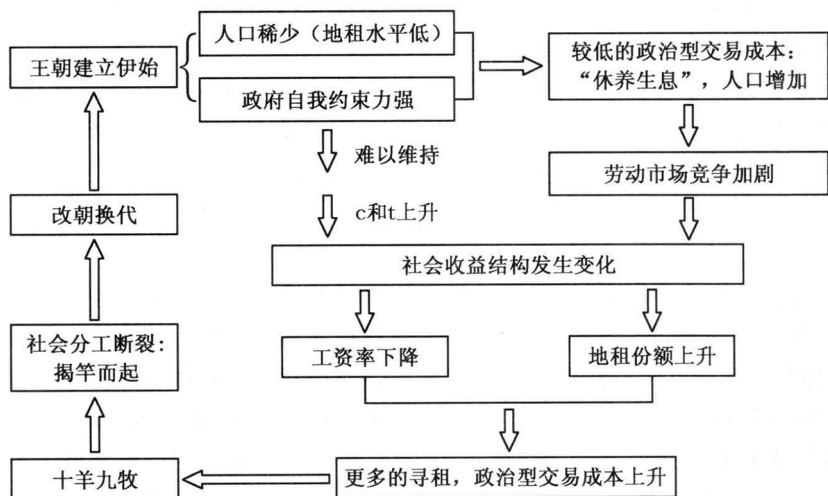


图3 理解王朝循环现象的经济根源

我们认识到,上述结论是基于局部均衡分析得出的,假定分析对象是一个技术进步缓慢并且封闭的农业经济,这一假定基本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同时,这一假定意味着如果技术条件和资源约束条件得以改善,王朝循环陷阱就有可能被破解。虽然对于一个封闭经济来说,技术水平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必然受到制度效率的约束,但对于一个技术落后的开放经济来说,资本和技术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因此,资本和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积累和进步,这也为落后国家摆脱“发展—制度”难题提供了可能。由此逻辑出发,一个社会如果要减少“潜规则”现象,摆脱王朝循环陷阱,就必须打破传统社会的结构性约束,即必须在突破资源约束和取得技术进步方面有所作为。历史学家黄仁宇(1997)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借助某种突破性力量,一旦经过这种突破,恶性循环即被打破,社会发展便走上正轨。迈克尔·佩罗曼(2001)认为,这股突破性的力量就是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过程中是一股关键的力量。

工业化过程是一个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工业化过程不断突破了原有的生产函数形式,提高了生产性活动的边际生产力,也提高了人们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成本,约束了非生产性活动。同时,工业化创造了一种新的物质资源形式——资本。资本数量的增长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这同样提高了人们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机会成本,约束了非生产性活动,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商文明有益现代国家”(武克刚,2005)。从我国实际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府通过强制措施将资源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领域。虽然这一过程存在公平和人道方面的争议,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化体系在我国建立起

来。从缓解资源约束这一角度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强制工业化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制度变迁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无论多么周密的国家计划都没有办法管理一个日趋复杂化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在客观上要求市场发挥作用,经济转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前计划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做出的制度性反应,转轨速度与转轨绩效与此密切相关。

五、结束语

我们认为,“潜规则”和王朝循环现象同时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绝非偶然,二者背后有着相同的经济根源: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潜规则”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制度的可执行性是不能被忽视的,制度命题不仅强调制度是重要的,而且更强调制度是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如果我国要加快向现代制度文明前进的步伐,建设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整体上摆脱“潜规则”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从约束制度变迁的因素上寻求政策突破口。同时,制度变革不是静态的,制度能够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以工业化为内涵的经济增长同样能够作用于制度变革,我国的经济转轨进程既包含经济结构方面(工业化)的内容,也包含制度方面(市场化和政府转型)的内容,并且二者相互作用。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使得本文更加充实,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 ①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7-01-16/084011009817s.shtml>.
- ②这通常被学界称为“威廉姆森命题”。
- ③ $x > y > 0 > z$ 这一设定依据的是“囚徒困境”博弈的支付结构,这也是对现实的观察,即欺骗者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老实人容易吃亏,导致血本无归,从而净收益为负。
- ④第三方制度安排包括私人治理,比如 Milgrom(1990)等提到的作为信息提供者的私人第三方,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中,产权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国家来界定(诺思,1994a)。
- ⑤如历史上的“约法三章”和“永不加赋”等。

参考文献:

- [1]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60.
- [2]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三联书店,1997:31.
- [3]金玉国,王琳.政治型交易成本测算的两个维度及其关系——基于中国分省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6—26.
- [4]麦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12.
- [5]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a.
- [6]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b.
-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联书店,2001:158.
- [8]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1,156.
- [9]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均衡博弈[J].经济研究,1995,(9):72—80.

- [10]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0.
- [11]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12]武克刚.工商文明有益现代国家[J].瞭望东方周刊,2005,(6):98—101.
- [13]Furubotn E, Rudolf Richter.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18—19,48,47.
- [14]Milgrom P, D North B Weingast.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J].Economics and Politics, 1990, 2(1): 1—23.
- [15]Sachs J, W T Woo,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J].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0, 1(2): 435—491.
- [16]Schlicht E.On customs in the economy[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17]Schotter A.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18]Wallis J, D C North.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1870—1970[A].Engerman S, Gallman R.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Economic Origin of Hidden Rules and Dynasty Cycle in China from an Angle of Transaction Cost

ZHANG De-rong¹, YANG Hui²

(1.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dong Economic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action co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wer and obstacl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t emphasizes the endogeneity of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the hypothesis of resource constraint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to explain the popular phenomenon of hidden rul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dynasty cycle. Opening-up provides a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the vicious cycle and the mandatory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planned economic period has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Key words: hidden rule; game equilibrium; institutional change; transaction cost

(责任编辑 金 澜)